



黄祖辉 著

TRANSITION,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

转型、发展与制度变革

中国“三农”问题研究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黄祖辉 著

转型、发展与制度变革

中国“三农”问题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型、发展与制度变革:中国“三农”问题研究/黄祖辉著.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ISBN 978 - 7 - 5432 - 1449 - 1

I. 转... II. 黄... III. ①农业经济—研究—中国②农村经济—研究—中国③农民—问题—研究—中国 IV. F32
D42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7768 号

责任编辑 忻雁翔

封面设计 路 静

转型、发展与制度变革

——中国“三农”问题研究

黄祖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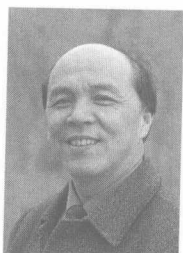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格致出版社
www.ewen.cc www.hibooks.cn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4层)



编辑部热线 021 - 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 - 63914081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1.25
插页 2
字数 383,000
版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32 - 1449 - 1/F · 69
定价 35.00 元



黄祖辉

教授, 博士生导师

1952年6月出生,籍贯上海。现为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卡特)主任;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省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农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等。

主要研究领域: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产业组织与制度安排。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等。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等中外期刊上发表论文200多篇,出版专著10多部。

作者电子信箱: zhhuang@zju.edu.cn。

1978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起步。2008年，中国的改革还在进行之中。中国的改革已经历时30年。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需要探索，需要稳健，对中国的改革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中国的改革更是使命式的，需要深化，需要攻坚，对中国的改革要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

谨以此书献给中国改革30年

序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其中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把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方针。会议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明确指出要想调动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必须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会议还以草案的形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力的25项农业政策、农村经济政策和增产措施，着重强调必须从中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科学文化水平低的特点出发，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与此同时，在1978年底安徽省遭受严重的旱灾，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在生产队长的带领下，决定把土地和生产工具分给农户使用，由他们根据合同承包粮食生产。这就是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令人惊讶的是，在遭受旱灾的条件下，新制度带来了相当于正常年份三倍收获的巨大丰收。在这一成功试验的推动下，“家庭联产承包制”首先迅速在安徽省被广大农民群众自发地传播推广，然后在1982年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中由中央政府给予肯定并在全国范围推广。

广大农民的自发创造和国家管理者的积极引导，以及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得农村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先突破口，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又为后来的

一系列社会改革提供了经验支持和物质保证。

回顾这 30 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社会迎来了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社会变迁。就“三农”而言，其变化也同样令世人瞩目。从农业生产看，1978 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是 28 272 万吨，到 2007 年增加到 50 150 万吨，增加了 77%；棉花产量从 1977 年的 204.9 万吨增加到 2007 年的 760 万吨，增加了 271%；油料从 1978 年的 401.5 万吨增加到 2 461 万吨，增加了 513%，水产品更是从 1978 年的 470 万吨增加到 2007 年的 4 737 万吨，增加了 9 倍多。从农民收入看，1978 年农村社员从集体分到的收入，人均 74 元，加上其他收入人均纯收入也仅为 133 元，约合每天 3 角 6 分。1978 年中国农村约有 1.2 亿人每天平均只能挣到 1 角 1 分钱，1.9 亿人每天平均挣 1 角 3 分钱，2.7 亿人每天平均挣 1 角 4 分钱。许多农民家庭，早出晚归、日晒雨淋、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却连最基本的温饱都得不到满足，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高达 67.7%。到了 2007 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4 140 元，是 1977 年的 31.13 倍，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43.1%，比 1978 年下降了 24.6 个百分点。在 30 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已从 1978 年的 2.5 亿减少到 2007 年的 1 479 万，贫困发生率从 31% 下降到 2%。从农村建设看，全国几乎所有的乡镇都已经通了公路，建制村通公路率也达到了 95% 以上，乡镇客车通达率达 98% 以上，建制村通车率达 85.3%。全国行政村通电话比重达到 99.5%，29 个省区市实现了所有行政村通电话。数据显示，在村村通电话工程将电话网基本覆盖到行政村的同时，农村互联网建设也实现了突飞猛进。全国 97% 以上的乡镇具备了互联网接入条件，92% 的乡镇已开通宽带，许多行政村也具备了宽带或窄带上网能力。此外，截至 2005 年底全国饮用自来水农村人口达 5.79 亿，占农村总人口的 61.32%。

以上数据充分显示了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农村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然而，当我们为这 30 年所取得的成就欢欣鼓舞的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新世纪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仍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耕地持续减少、淡水资源短缺、资源环境制约日趋严峻，农产品供求总量趋紧、结构性矛盾上升，来自国际市场的影响明显加大，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农民新的就业门路不多，农民的权益不断受到侵害，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不适应农民需求等等。因此，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面貌、稳定农业增长，依然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首要问题，需要广大实践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的努力探索和总结。

我和祖辉有着比较相似的经历：都是上海人，都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上山下

序

乡，都是赴黑龙江农场当农民，都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年进入大学，学的都是农业经济专业，毕业后一直到现在都是在从事“三农”问题研究，只不过是我一直在政府部门从事“三农”问题研究，而他一直在高校从事“三农”问题研究。

由他所著的《转型、发展与制度变革——中国“三农”问题研究》这本书的内容涉及了中国“三农”问题的众多方面，从基本的生产经营制度和组织体系，到具体的粮食生产、收入分配、劳动力转移、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合作等现实问题，从理论层面的深入研究到操作层面的政策设计，以及对国外经验的反思和借鉴。从时间跨度看，也恰好是30年整，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跨度相一致，这看似是一种巧合，却体现了一位理论工作者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的追求，以及对中国广大农民的那份情怀。

纵览本书收录的52篇研究文献，其中提出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许多新思路和新观点。诸多理论观点和对策思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依然有其旺盛的生命力。特别是近些年发表的一些研究成果紧紧围绕当前“三农”问题中的热点与难点，提出了许多极具建设性的政策建议。此外，书中在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中虽然较多地借鉴了以浙江省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解决“三农”方面的实践和探索，有一定的特殊性，但也同样能够为全国其他地区解决类似问题提供很好的参考和借鉴。

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事关全局。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已不仅仅是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面貌、稳定农业增长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既关系到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长远发展的问题，又关系到整个中国经济与体制的转型与现代化进程的问题，是一场影响数亿农民乃至十几亿中国人生活的划时代的经济社会革命。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艰苦奋斗，改革创新，一定能够实现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如期完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陳錦文

2008年4月7日于北京

前言

出生在上海的我，本来也许与“三农”，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是无缘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1969年，年仅17岁的我，没有任何选择地被卷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洪流中，从上海这座大都市来到了遥远的黑龙江，成了一名北国边陲农场的职工，开始了与各种农活打交道的生活，这一干就是9年，可以说是人生最宝贵的黄金时光全部奉献在了北大荒广袤的黑土地上，其中既有艰辛，又有回味。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与“三农”结下了不解之缘。做了9年的农民，在北大荒的土地上切身体验了中国农民的甘苦。由于大锅饭的体制和市场激励的缺乏，尽管几乎每天都付出艰辛的劳动，即使在零下40多度的寒冷冬天，仍然在地里大干，在变“冬闲为冬忙”，在热火朝天地“农业学大寨”，但效率仍很低，产出不高，所得更是微薄。渐渐地，自己就有一个愿望，就是要为中国的农民做点什么，这应该是我对“三农”问题有兴趣、有感情并且走上“三农”研究道路的初始原因。1977年恢复高考，为我走上“三农”研究道路提供了可能。4年的大学本科生涯，3年的研究生时光，以及尔后的留校任教和出国深造，我选择和从事的无不都是与“三农”问题最为密切关联的农业经济与管理专业。由于自己亲历了9年的农民生活和磨炼，尔后又经历了比较系统的知识学习和训练，因此研究“三农”问题不仅成了我人生的最大兴趣，而且将成为我一生的追求。

本书取名为“转型、发展与制度变革——中国‘三农’问题研究”，其主要

的含义，一是本书所研究的中国“三农”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农”问题，因而也是处于中国转型时期的“三农”问题。二是本书不仅从“三农”的视角研究中国的转型，而且还透过转型的研究，揭示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在这30年来的变化与发展。三是转型的核心实际上是制度的变革，这种制度的变革在实践中主要涉及体制、组织、产权、政策等方面的制度变革，而本书相当多的篇幅内容，实际上都与中国“三农”领域的体制、组织、产权、政策等方面的制度问题和制度变革有关。

今年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而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因此，2008年也是中国农村改革的30周年。纪念、回顾和反映中国农村改革的30年历程是本书的用意之一。其次，我的“三农”研究也已整整经历了30个年头，因此，这本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我这30年的“三农”研究的总结。我的第一篇“三农”文章是在大学一年级期间与几位同学一起撰写的《应重视国营农场的经营管理》短文。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我们学了一点理论知识后，对当时的国营农场经营管理体制的弊端提出了一些看法，毋宁说是我们在农村生活9后的新感悟。没想到这篇相当稚气的文章竟然得到了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的重视和推荐，进而发表在了1978年第12期的《经济研究》杂志上。从那篇处女作的发表算起到现在，我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和中国改革发展的历程一样，也已整整30年。在这30年中，中国的改革尽管经历了不少曲折，但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的道路不断探索、不断前进。我觉得，我这30年的“三农”研究不仅可以反映我对中国“三农”问题的探索过程和认知发展，而且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中国改革、转型与发展的轨迹。

回顾我的“三农”研究历程，实际上就是回顾中国的农村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改革处于起步阶段，当时占主导的改革议题和领域集中在农业与农村领域，当时的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热点主要涉及农村家庭承包制问题；农产品价格放开和农产品购销体制的改革问题；粮食生产与发展战略问题；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与道路问题；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等问题。在这一期间，“三农”研究者在国内占了主导地位，大家都是非常富有激情和少有顾虑。本人在那段时期有两项研究成果至今较有意义和价值。一项是对浙江省粮食发展战略的研究。由我为主撰写的《浙江省粮食发展战略探讨》一文（载《浙江经济研究》1985年第4期），由于提出了浙江粮食战略应从“完全自给”向“基本自给、大进大出”战略转变的观点，冲击了传统的粮食战略思路，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当时的我还是一名在读研究生，也被看成是“不重视粮食生产”的人物之一，承受了不小的压力。现在看来，这一观点并

没有错。当时无非在于提出这一观点的时机以及实施粮食市场化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但作为一个学者，这恰恰是应该坚持做的事情。事实上，浙江后来还成了全国第一个粮食市场化改革的试点省份。《求是》1989年第3期《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另一项是关于“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的研究。该项研究成果不仅发表在1989年第3期的《经济研究》上，而且还被评为“纪念中国农村改革十周年”优秀论文。现在看来，该项研究成果的主要贡献是：在当时我国农村工业（乡镇企业）发展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三就地”思路占主导的背景下，我们揭示了与“城市病”相对应的“农村病”问题，提出了农村工业化应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观点，提出了进城农业劳动力“市民化”的概念以及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建议。很显然，这些观点和政策主张在当时不可能引起重视或被采纳，因为从现在看来，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劳动力转移的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当然，也是这种增长方式的重要代价之一。实践表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央高层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和科学发展观思想的明确提出，我们当时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和政策建议开始纳入政府政策的视野，才开始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值得欣慰的是，这项成果经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专家评审委员会的评定，在2007年12月获得了突出学术贡献奖。这是对我们这一研究成果的最高评价，我从内心深处对这一评价表示感谢。（《求是》2008年第1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改革的重点进一步由农村转向城市，由微观转向宏观，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和发展浪潮。从“三农”问题研究看，当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比较集中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发展问题；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问题；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问题；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问题；农业综合生产率问题等。在这一时期初，我继续着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代表性的作品是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92）上的《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该文的主要贡献是测定并分解了乡镇企业的资本积累和创新（内涵）对农业劳动力的不同吸纳程度，揭示了我国乡镇企业吸纳大量农业劳动力的基本机理，即主要是依靠外延发展的吸纳，而不是内涵发展的吸纳。1992年底，受浙江大学包氏基金的资助，我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瑞典农业大学经济系，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进修与合作研究。期间，我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颇感兴趣，进而在国外比较系统地研读了新制度经济学。回国后，我将自己的“三农”问题研究重点放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农业组织、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应用上，试图对中国的转型与发展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和更好的解释力。这一期间，我发表了一系列的相关文章，如：《中国横店集团产权

制度构造的启示》(1995);《家庭农业:有效的农业组织管理结构》(1996);《公司加农户:农业组织的一种创新》(1997);《当前我国农户家庭经营中的交易途径与合约方式》(1998);《农地产权结构与我国的家庭农业》(1998);《论农户家庭承包制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1999);《农民合作:变革态势与启示》(2000)等等。在我的研究方向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产业组织与制度安排”。我觉得,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仅是研究转型问题和“三农”问题的重要工具,而且也是现代管理学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通过这一理论和方法的不断应用,新制度经济学又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研究领域。

进入新世纪以来,统筹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的理念开始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基调。这段时期的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热点与重点主要涉及:加入WTO及其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农村税费制度改革问题;农民增收与收入差别问题;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现代农业发展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组织发展问题;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土地制度与失地农民问题;农民工问题等等。在这一时期中,由于我承担了一些与“三农”问题有关的国家和部委的重大项目,如:“扭转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差别扩大趋势问题研究——着眼于收入不平等角度的分析与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生鲜食品物流系统构建中的组织与制度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理论、思路与对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土地制度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等。我的研究重点更关注:农民收入与结构分析;农产品供应链与产业组织问题;农村土地制度与农民权益以及农民工问题等。这些研究对我的压力和挑战很大,尽管已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仍然不很满意,尤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如何通过建立一个比较清晰的分析框架,从理论上对中国的“三农”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进而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把握,并提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思路与政策框架,还是有不少难度。此外,自从在1999年底组建了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CARD)这一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平台以来,我的“三农”研究中明显增多了“三农”政策与对策方面的研究,有不少对策建议得到了中央高层和省政府领导的重视和批示。本书第7章中有不少篇幅就是这方面研究成果的体现。

浙江省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比较快的一个省份,浙江省的改革与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一个缩影。浙江的空间面积并不大,仅10万平方公里,人口却已达5000万;浙江的自然资源也称不上丰裕,是“七山、一水、二分田”,但浙江的改革发展却走在全国前列。浙江发展的基本经验是体

制与机制的不断创新。浙江可以说是一个研究改革、研究转型、研究“三农”的富矿。我有幸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浙江，因而比较多地参与和见证了浙江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历程，自然地，研究浙江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书中不少文章是以浙江作为研究背景和对象的。我希望这本文集能够为读者了解浙江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一些启示，能够为热心浙江研究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些线索。

30年的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使我领悟到：中国的“三农”问题，既是一个任何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但对中国而言，又是一个在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所存在的特殊性问题。中国不仅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其中农民和农村人口占了绝大多数的大国，是一个经济正处在转型中的国家，而且还是一个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社会权利结构的国家。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难度不仅在于它是一个涉及经济发展与转型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涉及9亿左右农村人口权益改善与发展的问題。因此，研究中国“三农”问题极具复杂性，它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实际上却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和政治各个领域，与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转型，甚至与整个国际经济与政治格局都关联的问题，它既包括了农业经济与体制本身的发展、改革与转型问题，而且也涉及农村人口流动与就业，工业化与城市化道路，城乡关系与区域协调发展，产业组织与其他组织协同，收入分配与利益冲突协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三农”问题和全球化战略等多方面的问题。

当前的中国仍然处在经济、政治与社会的转型期，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还在进行之中，中国的“三农”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研究中国的“三农”问题还任重道远。很显然，研究中国这样一个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的“三农”问题，不仅对于中国这一人口大国的全面振兴和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于转型理论的构建、经济发展理论的完善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研究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三农”问题，不仅创新空间很大，而且极具挑战性。研究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三农”问题，需要从多个视角去探究，需要用多种手段去剖析，因此，仅有农业经济与管理的知识背景是不够的，需要跳出“三农”研究“三农”，需要不同知识的交叉和融合，需要团队的合作和共同努力。

本书收录了我这30年来研究中国“三农”问题所撰写的200多篇文章中的52篇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是在学术刊物和报刊上公开发表的，部分是未公开发表或在内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以我为第一作者或我本人独立发表的文章。对于合作的作者，我在文章开头给予了注释。考虑到体例方面的

要求，在编辑过程中，对个别措辞和标题做了技术性的处理。本书的内容结构并不是完全按照这30年的时间顺序来安排的，而是根据我所从事的“三农”研究的主要领域，将本书分成7个部分，不过，每章内的文章排列则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根据这样一个构思，本书除了前言外，第1章是关于粮食生产与农业发展方面的研究系列。第2章是关于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化方面的研究系列。第3章是关于产业组织与制度创新方面的研究系列。第4章是关于土地制度与改革探索方面的研究系列。第5章是关于农民收入与收入差别方面的研究系列。第6章是关于农村发展与战略思考方面的研究系列。第7章是关于论点辨析与决策建议方面的研究系列。

如果说我在这30年的中国“三农”问题研究方面有所感悟、有所前进的话，除了得益于这30年我们国家所处的改革开放时代以及所提供的良好研究环境外，还需要感谢我的CARD研究团队以及我的学生们，在本书不少文章的注解中，他们的名字将被相应提及。事实上，我的不少研究成果都是集体努力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思想交锋与火花碰撞的产物，我应该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我还要感谢中农办主任陈锡文先生对本书所作的序；感谢CARD同仁对我工作的一贯支持和帮助；感谢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格致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的支持。此外，我还要感谢蒋文华博士、张霞女士和曹慧英女士对本书出版的贡献，他们对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书稿整理工作，许多收录本书的文章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没有相应的电子文本，是他们帮助检索和编辑转化为电子文档。当然，书中如有什么错误之处，责任都在我个人。

作者 文并
“农三”的国中农研，央农研对本研修教育农研“农三”的国中作者文并
三”国大研封来研农又，封研普育研个一研农国中农研，然显研。研重研研
研于农且而，大重义意景农研兴研面全研国大口人一农国中干农研对不，农研“农
国大个一研农国中农研，前价研要重常非育善定研研野景农研送，农研研研研
国大个一研农国中农研，封研研具研且而，大研同空研研对不，农研“农三”的
农研，此因，研研去研手研农研要需，农研去农研个农研要需，农研“农三”的
不要需，“农三”农研“农三”出农要需，农研不景景景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
农研同共研研农研研研研研，合编研又农研研研研
研中章文景农00S的研研研研研“农三”国中农研来研30农研了景农研本
农研公未景农研，农研农研公土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
研入本农研农研研一景农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
研面农研研研研研。研研丁研研农研农研农研，农研研研研研研研。农研农研农研

目 录

第 1 章 粮食生产与农业发展

- 1.1 浙江省粮食发展战略探讨 /1
- 1.2 粮食产后处理系统的考察与思考
——技术进步的环境约束和出路 /5
- 1.3 农户粮田规模经营行为与启示 /9
- 1.4 农户粮田规模经营效率 /19
- 1.5 效益农业内涵、重点和对策 /27
- 1.6 现代生物技术及其在农业中的应用 /30
- 1.7 粮食市场化改革中的几个问题 /35

第 2 章 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化

- 2.1 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 /40
- 2.2 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45
- 2.3 非农化和城市化：浙江现代化战略的重点 /54
- 2.4 进城农民城镇生活稳定性及市民化意愿 /62
- 2.5 中国农民工问题与解决框架 /71

第 3 章 产业组织与制度创新

- 3.1 中国横店集团产权制度构造的启示
——兼论乡镇企业产权关系的明晰化 /77
- 3.2 家庭农业：有效的农业组织管理结构
——关于组织和交易费用的中国实例分析 /82

目 录

- 3.3 农户家庭经营中的交易途径与合约方式 /89
- 3.4 农民合作：必然性、变革态势及其启示 /97
- 3.5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
——基于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现状的探讨 /103
- 3.6 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制度安排 /113
- 3.7 我国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与制度分析 /122
- 3.8 生鲜农产品物流链的类型与形成机理 /132

第4章 土地制度与改革探索

- 4.1 农地产权结构和我国的家庭农业 /140
- 4.2 论农户家庭承包制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147
- 4.3 非公共利益性质的征地行为与土地发展权补偿 /154
- 4.4 我国农地制度的变迁历史
——基于产权视角的分析 /162
- 4.5 农村土地流转：现状、问题及对策
——兼论土地流转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影响 /167

第5章 农民收入与收入差别

- 5.1 农民收入问题：基于结构和制度层面的探析 /179
- 5.2 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基于转移性收入的角度 /189
- 5.3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问题
——基于村庄微观角度的分析框架 /199
- 5.4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问题
——基于农民企业家报酬的考察 /215

- 5.5 技术进步对我国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对策 /228

第6章 农村发展与战略思考

- 6.1 浙江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战略初探 /238
- 6.2 当前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几个问题 /246
- 6.3 20世纪90年代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的若干思考 /249
- 6.4 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252
- 6.5 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258
- 6.6 浙江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与启示 /264
- 6.7 全球化进程中的农业经济与政策问题
——国际农经学者协会第26届大会综述 /274

第7章 论点辨析与决策建议

- 7.1 必须重视国营农场的经营管理 /279
- 7.2 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看法 /281
- 7.3 实现农业、农村工业与小城镇的协调发展 /282
- 7.4 “九五”浙江农村经济面临的挑战 /285
- 7.5 合作：在经济运行中的功能 /286
- 7.6 正确引导粮田规模经营发展 /288
- 7.7 浙江现象与浙江经验 /289
- 7.8 土地承包款不宜当成农民负担而取消 /292
- 7.9 农民合作组织认识误区辨析 /293
- 7.10 城市化、农民利益与土地制度 /297
- 7.11 创新浙江发展农业发展战略 /299